

Carson McCullers

卡森·麦卡勒斯作品的 政治意识形态研究

荆兴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卡森·麦卡勒斯作品的 政治意识形态研究

荆兴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森·麦卡勒斯作品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 / 荆兴梅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 - 7 - 5161 - 7032 - 8

I. ①卡… II. ①荆… III. ①麦卡勒斯, C. —小说研究
IV. ①I712. 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247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王 影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125
插 页 2
字 数 215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麦卡勒斯的文学地位问题	(2)
第二节 麦卡勒斯作品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之争	(4)
第三节 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	(9)
第四节 伊格尔顿理论框架下的麦卡勒斯作品解读	(18)
第二章 《心是孤独的猎手》之“反犹主义”解构	(41)
第一节 《心是孤独的猎手》国内外已有 研究成果述评	(42)
第二节 麦卡勒斯的犹太情结	(54)
第三节 身份认同:解构“反犹主义”意识形态	(69)
第三章 酷儿理论视野中的《金色眼睛的映像》	(81)
第一节 《金色眼睛的映像》国内外已有 研究成果述评	(83)
第二节 朱迪斯·巴特勒视阈下的“酷儿”形象	(89)
第三节 权力与身体的角逐	(103)
第四节 “他者”的主体建构之维	(113)

第四章 《伤心咖啡馆之歌》:用诗意栖居

对抗技术异化 (120)

第一节 《伤心咖啡馆之歌》国内外已有

研究成果述评 (122)

第二节 技术异化:一个衰败的世界 (132)

第三节 诗意栖居:孤独者的救赎 (142)

第五章 《婚礼的成员》的战争观 (152)

第一节 《婚礼的成员》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156)

第二节 麦卡勒斯的战争体验 (166)

第三节 英雄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174)

第六章 《没有指针的钟》的身体政治 (182)

第一节 《没有指针的钟》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 (183)

第二节 残缺的身体:通向文化批评的物质媒介 (195)

第三节 从日常生活审美化到分裂的客体 (208)

第四节 音乐语言:整合狂欢式的身体碎片 (225)

第七章 结论 (240)

参考文献 (245)

第一章

引言

在璀璨的美国南方作家群中，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 1917—1967）无疑是值得书写和研究的。她从小被视为音乐神童，在遭受精神创伤之后，毅然转向写作以求得心理释放和救赎。除了一些散文、诗歌和评论之外，她一生共创作了5部长篇小说，由此奠定其令人难忘的作家地位。她的主要作品基本上完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犹太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成群结队的流亡知识分子等事件，都以隐喻的形式，若隐若现地穿梭在她的谋篇布局和字里行间。麦卡勒斯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1940）时，年仅23岁，读者好奇于女作家竟然如此年轻的同时，也相当惊叹其中的悠远意境和深邃主题。此后，《金色眼睛的映像》（*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 1941）、《伤心咖啡馆之歌》（*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1943）、《婚礼的成员》（*The Member of the Wedding*, 1946）相继问世。在麦卡勒斯的创作后期，尽管一直饱受疾病的困扰，精神危机也频频光顾，她却凭借“铁蝴蝶”不断蜕变的勇气，完成了鸿篇巨制《没有指针的钟》（*Clock without Hands*, 1961）。有评论家认为她是最有可能继承福克纳衣钵的美国南方作家，也有人公开质询她是否具有主要作家的身份和地位；有学者认为她个人情绪化色彩太浓、题材过于单调、缺乏理

性思维，也有人强调她的作品与意识形态和文化现实休戚相关。不管孰是孰非，麦卡勒斯引发了学术界的持久关注，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一节 麦卡勒斯的文学地位问题

麦卡勒斯的文学书写，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色，即美国的南方传统和地理特征。然而，对于她该被列为主要作家还是次要作家的问题，评论界曾经一度有过争议。比如著名传记作家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就说过：“至于她是否算得上主要作家，评论家尚在争论这个问题。”（Carr 1987：301）。当然，卡尔只是对麦卡勒斯作品的评论作某种呈现，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本人也持同样观点。而麦卡勒斯作品之所以会出现一些质疑的声音，是因为部分学者指出：麦卡勒斯的主要小说执着于同性恋、身体残缺等怪诞意象，将“精神隔绝”和“孤独”主题发挥到夸张的地步，以至于局限在狭小的私人空间中无力自拔，大大削减了其中的文化历史内涵。对于这种批评现象，朱迪斯·吉卜林·詹姆斯的解读可谓一语中的：包括地域、性别及性取向在内的一系列身份个性因素，影响了评论界对麦卡勒斯的研究深度和广度，致使至少三十年间有关她的评论，局限在单一主题上面；这些条件自动地限定了范围和相关性，致命地削弱了她的价值，使她成为偏见的牺牲品（James 1995：3）。詹姆斯认为：麦卡勒斯作品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误读和误解，显而易见是不公平的，是非常值得人们同情的。与詹姆斯持类似观点的大有人在，比如理查德·赖特、田纳西·威廉姆斯、斯皮瓦克等知名作家和文论家，都对麦卡勒斯其人其作高度赞赏。黑人作家赖特在与麦卡勒斯认识之前，就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过对《心是孤独的猎

手》的评论，称赞麦卡勒斯拥有令人惊叹的人性，使得一个白人作家能够像对待她的同族人那样，如此自然和公正地处理黑人角色，这在南方小说中还是第一次（卡尔 2006：135）。而威廉姆斯对于麦卡勒斯的崇拜之情，更加溢于言表：

一天晚上，威廉姆斯开始读一篇小说，这是一个他从来没有读过的南方同乡写的，书名是《婚礼的成员》。他彻夜不眠地读着，偶尔停下来只是为了擦眼泪，品味小说中蕴含的非同寻常的同情。剧作家立即把它的作者视为知己，而且相信她很可能是当代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他睡不着觉，干脆起床，披上一件长袍，写了他的第一封崇拜信。他告诉卡森，她是一个他非常敬重的作者，他非常想跟她见面。（卡尔 2006：275）

著名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将麦卡勒斯与德拉布尔、哈贝马斯等重要女性学者相提并论，“号召评论界在传统视野以外寻找新的途径来重新解读麦卡勒斯，同时超越‘失去纯真’等既定主题，探索文本中的种族、阶级、性别和性取向问题以及身份边界界定问题，通过分析西方文学中‘他者’的建构机制，达到批判当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最终目的。”（林斌 2005：162）斯皮瓦克希望人们用后殖民和后现代的眼光，来重新解读麦卡勒斯的著作，探索其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用主观能动的“小叙事”取代“宏大叙事”，从而解构各种权威和中心，还边缘化弱势群体以主体身份和话语权。

赖特、威廉姆斯和斯皮瓦克等人，都从麦卡勒斯的文学表达中，体察到她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的一面。赖特和前辈黑人作家一样，孜孜以求黑人的身份建构，他在麦卡勒斯这里看到了民主和

公正，因为麦卡勒斯总是以肯定和认同的姿态，来刻画书中的黑人形象。威廉姆斯发现了麦卡勒斯笔端孕育的同性恋形象，他们的分布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几乎每部小说都回荡着同性恋者的诉求。斯皮瓦克更是在麦卡勒斯的南方小镇故事中，捕捉到浓郁的“他者”气息，在社会畸零人和流散者的身上，洞察到解构权威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必要性。毫无疑问，除了上述几位知名作家和学者，抱有相同态度的评论家不在少数，他们都将麦卡勒斯视为经典作家，毫不吝惜对她的赞誉和推崇。麦卡勒斯不仅将同情的笔触伸向黑人社区、同性恋者，还延伸到了犹太族群、弱势女性、流亡知识分子，她的战争观、女性主义思想、种族理念，包含哲学理念和历史意义，无论对于普通读者还是专业学者，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研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麦卡勒斯作为一位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作家，无愧于美国主要作家的称号。

第二节 麦卡勒斯作品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之争

麦卡勒斯的创作，深受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群的影响。评论家认为麦卡勒斯的主要小说，既有福克纳的影子，也有安·波特等人的回声，这一点其实很多读者也深有同感。对于同时代南方作家的影响，麦卡勒斯鲜有公开承认，相反倒是竭力否认其中的关联。然而她却在很多场合，公然表明俄罗斯小说在其写作中的烙印。她最喜欢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她的最爱，他对他的作品可以说了如指掌，百读不厌。

在一篇 1941 年 4 月为《哈泼时尚》撰写的文章“我怀念的书”中，卡森描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和《白痴》——打开了一扇通向广阔精彩的新世界的门……在她几个月后的另一篇文章中，卡森表示要特别感谢那些她所称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们”，不只代表自己，也代表大多数当代南方作家。在她看来，俄罗斯的作家是极富创造力的大师，他们“把悲剧与幽默、伟大与卑微、神圣与淫邪，一个人的灵魂与唯物主义的细节并置，鲜明生动而又不露声色。”（卡尔 2006：43）

到仲夏节前后，卡森的写作一直保持着很好的节奏。她早晨写作，在慵懒、炎热的下午，阅读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她写信告诉戴蒙德（麦卡勒斯的朋友——笔者注），她希望可以避开这些作品，但俄罗斯人的性格已经融入她的血液里了。有时，她觉得自己实在太慵懒了，就是一个俄罗斯农夫在那里抓痒痒、捉苍蝇。（卡尔 2006：241）

在萨克斯顿看来，麦卡勒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尤其是《白痴》中，找到了自我文学书写的模板，诸如爱、精神隔绝和隐秘欲望等独特视角。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密希肯（Myshkin）融无能和神圣于一体，和《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残疾人约翰·辛格（John Singer），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麦卡勒斯对密希肯的关注和认同，对于读者理解她本人既挣扎又秘而不宣的性取向，是至关重要的。正如麦卡勒斯自己那样，密希肯和辛格是引人入胜的艺术形象，因为他们对宗教和信念充满质疑，就像他们对自身身体和性取向困惑不已。这种张力尤其体现于密希肯和罗

果仁（Rogozhin，《白痴》中的另一主人公）、辛格和安东尼帕罗斯（Antonopoulos，《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另一主人公）的关系中，里头的基督式怜悯，很容易混同于同性恋欲望（Saxton 2013：103—108）。尽管评论家注意到了麦卡勒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作家的渊源关系，但麦卡勒斯对后者现实性和批判功能的推崇模仿之处，却遭到了很长时间的埋没。

萨克斯顿对于《心是孤独的猎手》和《白痴》的对比解读，正是新批评理论框架下麦卡勒斯作品的阐释方向之一，即偏重文本的诗性意义。这种研究导向，使得人们过度强调麦卡勒斯小说的象征结构，而刻意忽视了其中的社会性和现实性。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麦卡勒斯貌似将个人体验倾注到各个人物的命运之中，仿佛在逼仄空间里演绎人生的悲欢离合，而实际上她刻画出心理遭受扭曲、身份被他者化的人物群像，从而控诉战争暴力和法西斯专政。新批评理论视野中的学者们，对《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所谓“抒情”意味过分强调，而作家希望读者感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性，往往被忽略不计。在《婚礼的成员》中，女主人公弗兰淇（Frankie Adams）的个体生活似乎是重中之重，世界大事好像远离了正在描绘故事情节；然而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希特勒的反犹政策也在四处蔓延，它们都渗透在表层文本之下，活跃在深层文本的丛林里。正如林斌所归纳的那样：“在这种影响下（新批评理论），麦卡勒斯小说的大量早期评论焦点集中在作品的诗性方面，甚至有些评论家将她的小说描述为‘抒情诗式’文体。这样一来，作品的现实主义意义几乎被象征主义寓意削弱甚至埋没掉，其直接后果就是场景描述和人物刻画被剥夺了历史文化个性而赋予了普遍性的抽象寓意……以‘新批评’为导向的麦卡勒斯研究大多忽视甚至隔断了个人遭遇和生活感悟与机构化暴行二者之间的关联，

诗性分析掩盖了作品的深层社会意义。”（林斌 2005：160）

当人们终于意识到新批评理论解读麦卡勒斯作品的局限性后，便开始把眼光转向意识形态和社会层面。就这一点而言，麦卡勒斯的同性恋主题和社会关系问题，是无法避开的一个维度，而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在这方面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如果说酷儿理论发展之初专门面向同性恋群体的话，那么随着岁月变迁和时代进步，它已经大大拓展了自身的兼容性。在当今世界，酷儿理论依然有“性别身份背离”的意思，但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扩展到了所有规范性之外、遭受压迫的事物。尽管性倒错如今是一个被认可的理论，但在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同性恋并未得到社会认同。这个群体在公众眼里是病态的，在自己眼里是罪恶的，所以他们一般采取自我否定的态度。女同性恋者不可能将性取向暴露于公共领域，因为这种约定俗成的不伦之恋，只能处于失语的状态之中。20 世纪 20 年代的报纸写道：那些遭受“男性心理状态”（masculine psychological states，即婚外情）的女性，通过摘除一只肾上腺而得以治愈。读过这些消息的妇女，除了以沉默来应对自身的遭遇，还能有什么办法呢？（Faderman 1991：105，99，100）麦卡勒斯一直将自己当成是生活的“局外人”，常常发出身世飘零的感叹。同时，她隐秘的女同性恋身份，处处显示出困顿的局面。于是，她将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的困惑，幻化为一个个熠熠生辉的怪诞意象，铺陈到小说的纹理之中，将“酷儿”的维度加以提升和发扬光大。这一切的背后，潜藏着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即主流社会倡导的异性恋中心主义。主流价值观只认同规范和统一，贬低差异和流动性，将有别于社会正统的同性恋视为异端，实则是专制意识和集权思想在作祟，与当时的法西斯主义和美国例外论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而这些，都是麦卡勒斯力图通过写作来解构的，也是她希望

读者和评论家能够了然于胸的。

麦卡勒斯的创作，不仅隐秘地书写了同性恋身份认同欲望，而且还展现了反犹浪潮、种族歧视等意识形态规范，并同样对它们实行消解和颠覆。

休斯和作曲家纳森尼尔·戴特是最早的两个居住在沙都的黑人，卡森非常享受同他们在夏天建立起来的友谊。另一个待到秋天的作家是阿尔弗雷德·坎托罗威茨，一个43岁的德国犹太人，曾经是法学院的学生、文学评论家、驻外记者和作家。卡森被他的传奇经历所吸引，把他当作自己的新偶像。他从纳粹统治下逃离德国，在法国避难，却在1940年被维希傀儡政府拘留，后来历经艰险终于在1941年逃出了盖世太保的控制，安全抵达美国……她大睁着眼睛，一遍一遍地询问有关他的流亡生活、地下活动、集中营、西班牙内战（反抗弗朗哥）、监狱、逃跑和焚烧书籍等细节。卡森对坎托罗威茨感叹说，希特勒的德国不再是“歌德和席勒的故乡，法国也不再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土地”……（卡尔 2006：223）

综上所述，早期的麦卡勒斯研究更多地倾向于审美性层面，而后来其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得到不同程度的挖掘。相比较而言，应该说两者各有千秋：前者注重作品的诗性表达和乡土气息，对叙事策略和文体形式多有研究；后者跳出了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框架，将麦卡勒斯作品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考量，对不公正的社会意识形态实行解构。“‘新批评共识’代表早期麦卡勒斯评论的主流方向，而且至今仍然在麦卡勒斯研究领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与生理残疾人、社会畸零人、具有反叛意识的青少

年形象和南方文学传统上的怪诞手法密不可分的‘精神隔绝’主题称为麦卡勒斯创作及其作家身份的标志。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十年来，不同时期的麦卡勒斯研究者一直都在以不同方式破解这个‘精神隔绝’之谜，而后期评论家的贡献就在于不断超越‘新批评共识’的局限性，在特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实现‘精神隔绝’主题内涵的探索性解读。”（林斌 2005：163）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希望通过本书的麦卡勒斯研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从文化上建构一个和谐平等的大同世界。

第三节 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最先是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特拉西提出来的。虽然柏拉图和培根等人，很早就对意识形态进行过思考，但并未形诸理论术语，而且具体到深度和广度方面，也与今天人们所熟知的意识形态理论无法相提并论。在 1796 年和 1798 年间，特拉西向巴黎法兰西研究院分期宣读了论文《关于思维能力的备忘录》，正式提出了“意识形态”一词，为马克思等学者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基础。特拉西把意识形态定义为“观念的科学”，其中至少包含两层重要意义：第一，人们用理性代替神学来考察世界；第二，理性思索与物质世界相比，前者更具备优越性，因此对社会现实具有引领和指导作用。以特拉西为代表的理论家们，将意识形态运用到政治干预和文化实践之中，希望借此将国民制度改造成理想状态。特拉西的意识形态观念，可贵之处就在于试图瓦解专制政权，以至于被独裁者拿破仑视为“一种危险的政治情绪”加以抵制。尽管如此，特拉西倡导文化的政治功能，反对各种形式的独裁统治，对后来的意识形态发展和研究，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王宗礼、史小宁

2012: 5—10)。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建立在先辈理论家的基础之上，却又呈现出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加崭新的高度。在《批判理论的理念》一书中，莱蒙德·格斯（Raymond Guess）将意识形态分为三大类，其中第二种为“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曲解社会存在，掩盖社会存在的本质（俞吾金 2009: 129）。马克思与此种观念不谋而合，学界普遍认定它就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理论内核。在笔者看来，以上意识形态论至少拥有三重含义：首先，马克思超越了特拉西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色彩，看待现实问题更为冷静和犀利，直接把意识形态视作社会上层建筑的标签；其次，马克思的矛头直指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认为正是官方宏大叙事所呈现的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统治着普罗大众；再次，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质是当权者的利益体现，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篡改和扭曲事实，代之以虚幻的价值体系，来愚弄和欺骗民众。毋庸置疑，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否定既存社会秩序的批判性，同时也看到了解构这一切的可能性，这就不难理解他会提出这样的历史发展道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获得解放和自由的光明前程。

在意识形态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还有来自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1968年法国爆发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深深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就是对这次事件的回应。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写出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等著作，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思索由来已久，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和实践储备。他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表于1970年，可谓是水到渠成之作，令意识形态本质的相关

研究，又有了新颖而重要的突破点。其一，如果说维特根斯坦是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关键人物，海登·怀特是历史语言学转向的集大成者，那么阿尔都塞就是意识形态语言学转向的先锋。阿尔都塞把意识和语言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敏锐地洞察到了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和表意过程的重要性。其二，马克思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着力强调意识形态的“意识性”，而阿尔都塞却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性”，认为社会中的一切都浸透着意识形态，它体现于所有事物之中，是仪式性和实践性的客观存在；同时，操纵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以各种具体的政府机构和规范形式遍布于社会，无疑是物质性的。其三，人类的生存境遇虽然有真实性和物质性的一面，但是在用语言进行表征时，无论是主流阶层还是边缘群体，都只能书写出想象性的关系。其四，意识形态的渗透性和统治性，唯有经由具体的主体才能实现，马克思主张经济领域的再生产，阿尔都塞则提倡人的再生产：一方面上层建筑通过意识形态来限制和剥夺主体的自由，另一方面主体也可以通过特有的解构方式争取身份独立。

伊格尔顿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继承、发展和超越。伊格尔顿出生于爱尔兰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后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师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著名旗手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他先是充当威廉斯的助手，后来辗转于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地任教，以犀利激进且挥洒自如的笔锋，写出一部部皇皇巨著，成为当代英国审美政治和文化批评领域的巨头。伊格尔顿认为阿尔都塞所阐释的意识形态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主体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之一，而《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本书，改变了当今人们关于意识形态的思考进程。

作为阿尔都塞学派在英美的代表人物，伊格尔顿的理论
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有着极为密切的承继关系。虽然
伊格尔顿在提及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时经常伴随着严厉的
批评，但是他始终高度评价它的价值。实际上，自从《马克
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以来，伊格尔顿从来没有真正走出
阿尔都塞的影子，是将阿尔都塞的理论运用到美学研究以及
艺术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由于他对阿尔都塞理论的缺
陷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使他可能对其做出补充、完善和发
展。（罗良清、格明福 2006：30—34）

在继承的基础上，伊格尔顿也发现了阿尔都塞理论的不足之
处，为了避免日后走入类似的困境，伊格尔顿于是在方向上做
了一些调整，在理论实践中进行了大胆尝试和突破。

形态的理论方法运用到审美现象和艺术问题的研究中
来，在理论上存在着一系列困难，阿尔都塞本人及其学生都
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来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然而，审
美现象的经验性与阿尔都塞学派的理性哲学传统的深刻矛
盾，严重地影响了后期阿尔都塞学派在美学研究方面的深入
拓展。审美活动作为一种交流过程，既受意识形态的支配、
影响和制约，又存在着偏离和超越意识形态的一面。伊格尔
顿与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着重于审美
活动的经验基础研究。他指出，人的身体作为审美活动的物
质载体，在研究和阐发美学意识形态的机理方面，是理论研
究的重要内容。对现代西方美学的许多矛盾和难题的研究，
也应该从现代人的身体状态以及现代美学在这方面的反应这
个纬度作出分析和说明。（王杰 2013：401）